

古籍點校總彙

二

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



中华书局

古籍点校疑误汇录

(二)

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籍点校疑误汇录.2/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
小组编.一北京:中华书局,1990(2002重印)

ISBN 7-101-03613-9

I. 古… II. 国… III. 古籍整理—中国—文集
IV. G256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1352 号

责任编辑:沈锡麟

古籍点校疑误汇录

(二)

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

*

中华书局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5 印张·265 千字

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3001-5000 册 定价:25 元

ISBN 7-101-03613-9/Z·454

序

近年来，有关古籍的整理，从标点上、校勘上、注释上说，都是很有成绩的。但部分的书，或书的某一部分，标点不当，校勘不确，注释不精的情况还是有的。譬如中华本《二十四史》，是以一个极整齐的专家组织来完成的，亦不是无懈可击，细细阅读，仍然会找出一些标点不当的地方。

标点，总的要求是适当的分段，恰当的应用逗号、句号、顿号、分号和冒号这些符号来断句。可惜古人著作，逻辑性不强，有时段落不清，因此分段时某些句应属上，应属下，也颇费斟酌。断句则有各自对文义的理解的程度，某字属上，某字属下，甚至有些文句，至今仍属争议，未能一致通过。除此之外，其所以不当，也有一时的疏忽之处。

校勘就有底本、校本、参校本的问题，异字、异文的裁断的问题，衍文、错简的认定的问题，以及其他问题。特别需要有汉文字学的知识，其不当之处，就不能推之于一时疏忽了。

至于注释，更首先要求是有关这一古籍的专门知识，

其次是相应的辅助知识。不懂先秦文字的使用，不懂墨家哲学，不懂一点科学，要注释《墨经》就比较困难了。这不是一般的目录学，一般的校勘学所能应付得了的，勉强搞出来的东西，自将疵漏百出了。

同时，还有编辑一道关。作家颇不满意于编辑先生的经常退稿，并附一复信，指出这里不行，那里不行。其实，当编辑的工作是很苦的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寄来的或约定的稿子，都得通读一遍。编辑只是一种职务，它并不表示比来稿的作者的知识水平就怎么高好多。即或通读了，有些点、校、注的错误，也会在编辑的眼皮下溜过。编辑不能负一切责任，但有些书的点校情况不佳，而又居然出版了，则显然是编辑把关不严之过。

因此我们经常在文、史、哲的期刊上，在各大专院校的学报上，看到有些文章，对于某些古籍，或某些古籍的某些部分，针对校点不当，校勘不确，注释不精的地方，详细提出意见。有关这些意见的文章，发表时间有早有迟，学术范围有文，有史，有哲，议论水平有的成系统，有的属随笔。且散在各期刊上，如需参考，实难随手查核。现在，我们尽可能就所见所闻，广事搜集，把它们录为一编，付之排印，以便翻检。

这些作者是不是有意向鸡蛋里挑骨头呢？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：一是原书不误，鸡蛋里并无骨头可挑。二是原书确有误，居然在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了。我们不想自居于法官地位，滥行裁决，我们亦不是任何一方的辩护律

师，辩称你错他对。我们现在虽然把这些有意见的文章搜印在一起了，我们却采取个“和稀泥”的办法，把这本书命名为《古籍点校疑误汇录》。这可能会成为一本对校勘学有辅助意义的书。图书馆或可供陈列参考；出版社或可根据已提出的意见，在印第二版时有所改正；文史哲各门的研究者或可从中吸取一点经验教训。假如我们在这方面的古籍整理水平逐年都有所提高，使那些挑骨头的同志们，无所着笔，这类汇录就不必再印第二本了，实为万幸。

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大，治学态度稍事严肃，就会大大改观。乾嘉学风主要在创造发明方面，其末流乃流为烦琐，为世诟病。今天的问题，在于继承乾嘉学风当中，不是发扬主要的方面，而是模仿末流且又过之。

兹姑以王引之的《经传释词》为例。

王著《经传释词》十卷，共列词二百五十四字。本书全文概计为十万字，平均每词举例不超过四百字。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、春秋史传，以及有关注家，都引用到了，文字却非常简洁。引注家时，有“王肃注”、“皇侃疏”、“颜师古注”等，而对郑玄的注，则只“郑注”两字，杜预的注，则只“杜注”两字。词字注音只有：“吹音聿”、“台音饴”、“号音豪”、“乡音向”、“汔音迄”、“邪以遮反”、“于音乌”、“惄鱼覲反”、“其音记”、“其音姬”、“詎·巨逮二音”、“徂读为且”、“且子余反”、“曾音增”、“曾音层”、“晉音惨”、“嵫音茲”、“毗音紫”、“啻施智反”、“属音烛”。十六处音

读，四处反切，仅为全书列词的百分之八。而这类音读的标示，皆和释词有关，不是为音读而音读。全编整个结构极为朴素，到能说明问题解决问题为止，绝无枝蔓之嫌。举某一词作某解，引用一古籍文句之后，例将某解替换某词，以明文义。而后又复举古籍若干例，则不再分别以某解替换某词，仅结言“义同”、“义并同”、“其义一也”、“义亦相近”、“互文耳”、“皆仿此”，等。或则于引用古籍文句之后，接以“是也”二字，或直言以上皆某义，以证其说。又如引用典注与己意不合者，则多结言，“于义未安”、“故多不安”、“失之”、“解者皆失之”、“皆于文义未协”、“则失之矣”，或直言“非也”。这既合于“举一反三”之理，亦使读者自行思维，经过词义一一替换的过程，加深了解，自此，变王引之的释词为读者自己的释词。在这个基础上，读者将会在运用方面，有所发扬，扩大这一认识范围。近人张相为《诗词曲语词汇释》，依例举词，以释词曲，文从义顺，灿然成编，《经传释词》之作实为其先导。

对于《经传释词》，章太炎虽然写了一篇《王伯申新定助词辩》，以正王误，以申己说，但所列词不过十一例耳，尚不足王著列词的百分之五。但章在其《检论》上说：“（王）念孙疏《广雅》，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，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。授子引之，为《经传释词》，明三古词气，汉儒所不能理绎。其小学训诂，自魏以来，未尝有也”，给了王氏父子以极高的评价。所以这样能形成所谓“乾嘉

学风”，学者绝不依傍汉儒，而在熟读深思，独创新解。乾嘉学派的大师都是些有创见的人，其著作作风也是很朴素简洁的。这一派的后起者，乃以堆垛为事，烦琐为上，抄袭为能，流弊所及，自成为魏源、龚自珍直接攻击的对象。仍以《经传释词》为例。近人如拿到这个题目，即或还是二百几十词，但在写作上则非加上十倍，写够一百万字不可，似乎不如此不见功力。我偶翻《魏源集》（中华书局标点本），见其《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》，他引了班固《艺文志》一段话，现节要于下：“……后世经传既已乖离，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，而务碎义逃难，便辞巧说，破坏形体。说五字之文，至于二三万言，后进弥以驰逐。……”看来烦碎之祸，早在东汉就有了，以此亦不能完全怪在乾嘉学派身上。解释五个字就要二三万言，是每字的释文当为四千字到六千字。做部《经传释词》，以每词四千字为准，天公地道，自然就该一百万字了。

这些注家大概都把读者看成劣等中学生，不会查字典，普通到一二三四，都要引《说文解字》，以证明其一是一，二是二。这不过起了抄录的作用，即抄录亦无真知灼见的抉择；对于前人立意，未必了了，即有，亦依违其间，无可否。对于此一学术领域，真正有何创见，有何发明，就更难说了。至于行文之啰嗦，动辄数十万言，既嫌词费，亦类炫博，其例甚夥，皆无当于学术著作之实际意义。

遵循唯物辩证法的逻辑，议论则独具匠心，务去陈言，述作则力求精炼，誓戒烦琐，十年二十年后，其影响所及，或能对中国古籍之整理与研究，养成一种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。凡此所言，尤愿青年学者留意及之。

《汇录》辑成，因为之序。

一九八四年大暑 李一氓

出版说明

1981年7月,中共中央发出了《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》,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,任命李一氓同志为组长。经过半年的筹备,规划小组于1982年3月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工作会议,制定了《古籍整理九年(1981—1990)规划》,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呈现生机勃勃的气象,仅1982—1983年两年,即出版新书510多种,重版书350多种,两者合计860多种,闹了多年的“书荒”问题随之缓解。面对古籍整理成绩喜人的局面,李一氓同志及时提出质量问题,指出有些书标点不当、校勘不确、注释不精,并于1983年年底要求规划小组办公室尽可能就所见所闻,广事搜集,把在文史哲期刊上发表的批评性文章录为一编,付之排印。根据李老的指示,规划小组办公室自1983年至1990年,逐年将各种文史哲期刊和大专院校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古籍整理(包括标点、校勘、注释、今译)的批评性文章,汇编成《古籍点校疑误汇录》(以下简称《汇录》),第一、二册作为内部资料印发,三、四、五册改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,六、七、八册未曾付

印,但基本上业已编就。

《汇录》第一册于1984年出版时有一《说明》,主要内容是:收入《汇录》的文章,大致按综合,文学(诗文、小说、戏曲、文学评论),历史和工具书顺序编排;至于文章内容,除个别注释予以删节,个别错字径予改正外,概仍其旧,其批评正确与否,编者不作判断;文章中批评的一些点校本、注释本、今译本,容或存在所指出的问题,但批评者往往就个人的见解提出意见,并非系统的评论,因此并不表明被批评的书质量必定很差。今天看来,其态度和做法,还是相当公允和稳妥的。

对《汇录》的编印,李一氓同志十分重视,亲自为该书拟定书名,撰写序言,题写书签,并予以充分肯定:“这可能会成为一本对校勘学有辅助意义的书。图书馆或可供陈列参考;出版社可根据已提出的意见,在印第二版时有所参酌改正;文史哲各部门的研究者或可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”,使古籍整理水平逐年有所提高。由于《汇录》不仅为查找资料提供方便,而且对研读古籍有一定的辅助作用,许多古籍整理工作者视之为良师益友,一些大专院校还将它列为文科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。不久前,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出于对古籍整理人才培训的需要,要求我们重印出版,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。由于时间较紧,近日只推出前六册,后两册尚有一些编辑工作要做,估计年底才能出版。

这套书的重印出版,得到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

领导小组的资助，在此谨致深切的谢意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2年10月

目 录

- 克服轻敌思想，努力减少标点错误 程毅中 (1)
训诂学与古籍整理 郭在贻 (9)
古典文学新选新注本释义商榷十则 计伟强 (26)
略谈古典文学注本的引证 崔 茅 (34)
《全唐诗续补遗》校读 房日晰 (39)
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 周一良 (65)
李清照诗考释——《李清照集校注》补正 张昌余 (74)
《汤显祖诗文集》徐笺补正 马泰来 (88)
贺铸《六州歌头》笺注札记 钟振振 (94)
重印本《太平广记》疑误 王 锰 (103)
《夷坚志》校点补议 王 锰 (109)
敦煌变文校勘辨补 刘凯鸣 (115)
敦煌变文校勘零拾 袁 宾 (126)
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补记 袁 宾 (133)
《敦煌变文集》校补 袁 宾 (146)
校补本《成化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》补正 胡竹安 (161)
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》、《元本琵琶记校注》
语词释义辨补 王 锰 (172)

-
- 《宋诗话辑佚·古今诗话》校点献疑二十六例 钟振振 (180)
读《宋诗话辑佚》札记 钟振振 (193)
评《历代诗话续编》的校点
——从《碧溪诗话》谈起 周本淳 (210)
成都影印本《说文段注》的圈点错误 葛信益 (234)
读《战国策》新校点本札记 熊宪光 (242)
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译注斟补 秉 劲 (255)
关于《史记》标点问题的札记 刘家钰 (272)
《史记》(本纪部分)校点商榷 吴静容 (282)
《魏书》校勘拾零 陈金戈 (291)
两《唐书》标点琐议 李 恭 (303)
《旧唐书》勘误一得 修 月 (311)
《旧唐书》漏校八例 彭 池 (312)
《五代史》标点献疑 李 恭 (317)
标点本《宋史纪事本末》正误 王树民 (321)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前八十卷点校中的一些问题 梁太济 (330)
有关《长编》前八十卷点校问题的补充意见 梁太济 (350)
对点校本《长编》的补充意见之二 梁太济 (354)
《辽史·高丽传》校勘二则 苏 荣 (357)
《元史》正误二例 李梦生 (359)
《明史》标点正误杂录 陈支平 (363)
《明史·李自成传》勘误一则 胡 静 (374)
《明通鉴》校点拾零 官大梁 (375)
《清史稿》标点讹误举例 汪宗衍 (377)
《清史稿》医家传记误述考订 杨士孝 (383)

标点本《二十四史》《清史稿》和阮元《畴人传》

- 错讹举要 管成学 (387)
古籍校点讹失举例 龚勉之 (399)
中华本《游宦纪闻》《旧闻证误》标点订误 甘 瑞 (415)
《梦粱录》点校失误举例 林正秋 (417)
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勘误一则 陈秉仁 (424)
文言错讲 实词误解
——评《常用文言实词讲解》 仲 平 (426)
《室名别号索引》(增订本)校读小记 谷 林 (433)
《中国历代名人辞典》订误一例 官大梁 (437)
《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》条目辨正 张建清 (439)
《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》商榷三条 官大梁 (441)
《汉书人名索引》错误举例 张如元 (443)

克服轻敌思想，努力减少标点错误

程 毅 中

整理古籍，标点是最基本的工作。唐人李匡文说：“学识如何观点书。”（《资暇集》）可见古时点书就需要有丰富的学识。我们今天去古已远，标点古书的困难就更多了。近年出版的古籍标点本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标点失误的问题，即使是专家学者整理的书也在所不免。看来，标点还是古籍整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。

我们说错误多少，也是比较而言的，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。如果是一部三十万字的书，平均按十个字一个标点符号计算，那么三十万字应加三万个标点，千分之一就是三十处，即使出了一百处错，错误率也只是千分之三多一些。可是一说这本书错误百出，读者就不敢信赖你的标点本了。

标点的质量还不能简单地按比例计算，有的书错误并不多，只是错得怪，就是说它属于常识性的错误。有些问题并不怎么难解决，或者说一般读者都能解决的，却偏偏出了疏漏，就不免令人笑话。可是哪些问题属于常识性范围，却因人而异。可能对一般人说是疑难问题，对专

业工作者说就是常识问题。一般地说，标点古书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化的知识，还要有较多的专业知识，否则就难以胜任。

然而，标点古书很难避免出错，甚至是不可避免的。有些专家学者点校的书，也不免有错。如《资治通鉴》是好几位历史学家标点的，出版后陆续发现的错误却数以千计。吕叔湘先生曾写了一篇《通鉴标点琐议》（《中国语文》1979年1—2期），举了一百三十二例，分为三十类。这些类例很值得我们参考。二十四史出版之后也分别发现了一些错误。新版的《全金元词》、《全辽文》、《宋诗话辑佚》等书在标点上也有一些疏失。我这里举一些专家学者所整理的书稿为例，并不是对学有专长的老先生们吹毛求疵（其实有疵还是应该求的，但不是故意挑剔），也不是为编辑工作者把关不严开脱责任，只是说明标点古书确是一件难事。目前从事古书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多数是中青年人，他们古书读得不多不熟，除了专业知识不足，还有专业知识太“专”的问题，如学文学的不熟悉历史，学历史的不熟悉哲学，一般语言文字学的基础都较差，特别是不熟悉经学，不象老一辈学者，对四书五经等基本文献都是能背诵，所以标点古书的困难很多。

标点出错，分析起来，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。一是知识局限，包括古代汉语、古代文化和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足。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，有待于刻苦读书，长期积累。一是工作粗疏，掉以轻心，编辑作风不